

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

（成都：巴蜀书社 2008 年版）

喻遂生教授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研究东巴文，持之以恒，创获渐多，于 2003 年将部分研究成果辑成《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这可以视为喻先生前期研究纳西东巴文的阶段性总结。近来喻先生又不断深耕开拓，形成《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以下简称《第二辑》）。

《第二辑》共收论文 25 篇，外加一篇田野考察笔记。是喻先生 2003 年至 2008 年间对东巴文研究的又一阶段性总结。《第二辑》继《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有延续和深入，又有新的开拓，特别是强调了研究取材方式的转变和新研究方法的引入。今择其要者略述几端。

一、对东巴文结构研究的总结与开拓

喻先生以前对东巴文结构的研究用力甚深，采用经过改造的“六书”理论，深入研究了东巴文的象形、形声、假借、转意（后来喻先生称为“借形”），尤其是形声字的研究，尤为深入透彻。连续发表了《纳西东巴象形字研究》《纳西东巴形声字研究纲要》《东巴形声字的类别和性质》《纳西东巴单音节形声字研究》《纳西东巴文多音节形声字研究》《汉古文字、纳西东巴字注音式形声字比较研究》《纳西东巴字、汉古文字中的“转意字”和殷商古音研究》，这些文章都收在了《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中。喻先生还指导研究生做了《甲骨文纳西东巴文会意字比较研究初探》的研究。《第二辑》所收《纳西东巴文“六书”概说》一文，除了对以前的研究做了系统总结，还补充研究了东巴文的指事，并对每一种造字方法做了界定和特征分析。

《纳西东巴文形近字、同形字释例》提出了东巴文形近和同形字的问题，举例考释了东巴文中的 10 对形近字、同形字。《纳西东巴文疑难字词考释举例》从疑难字词释读的角度，指出了一些东巴文形体演变的轨迹和释读的方法。

二、对东巴文研究取材方式转变的呼吁和尝试

《东巴文研究材料问题建言三则》提出东巴文研究要将取材方式从以字典为主转向以东巴文原典为主，并编写便于利用的字释和基于原典的东巴文大字典。

过去东巴文的研究材料主要取材于几部字典，而这几部字典都存在收字不全，字符的形体、意义经过人为归纳的问题。收字不全导致采用默证法的研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人为归纳往往掩盖了东巴文发展演变的过程状态。过去在东巴文译注材料没有大量刊布的情况下，东巴文研究主要取材于字典是不得已为之。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 卷的出版改变了以往东巴文译注材料缺乏的局面，故喻先生及时呼吁东巴文研究取材应逐渐转向以经典文献为主，这对于矫正时弊，推进东巴文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而如何实现这个转变，喻先生也提出了解决方案：一是充分利用应用性文献，喻先生自己也调查刊布了不少此类文献；二是编写各类经书的字释。因为东巴文之类的原始文字，在书写经书时，大多没有逐词记录语言，且文字不成线性排列。以前通用的四对照译注方式因为体例的限制，不可能对字源有详细的说明，也不可能指出经文中运用的是字的本音还是变音，是词的本义、引申义还是假借义，不能把东巴经的字词分析落到实处。很难弄清经文中的某个字究竟对应于何词、何音、何义。所以现有译注成果实际上仍难以使用。只有经过字释的译注资料，才能方便地被文字学和其他方面的研究者利用。喻先生在《第二辑》中采用字释方式刊布大量应用性文献，同时还指导研究生作了部分经书的字释。

三、刊布并研究大量新的东巴文应用性文献

过去一般认为东巴文用于书写宗教文献东巴经，偶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还用于日常应用。李霖灿先生（1984：65）说：“么些文字的日常应用，大致不出谱牒、记帐、书信三项，谱牒、帐目，我曾在么些地区着意搜求，毫无所获。书信则只见到几封最近军人的家书，这可见么些文字在日常应用上份量的稀少。”应用性文献是纳西族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比较零散，以前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收集、整理、刊布、研究都做得很不够。以致造成一种学术界的普遍错觉，东巴文只用于书写东巴经，由东巴掌握。

喻先生（2002）在第一届国际东巴艺术节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考察》，提出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研究价值，并发表了《一封最新的东巴文书信》。近年喻先生经过艰苦的田野调查，收集、译释、刊布了多种应用性文献，并分别就书信、地契、规程、题词、帐簿等应用性文献作了深入研究。

地契研究方面，《第二辑》收入了《东巴文卖拉舍地契约译释》《东巴文白地买山契约译释》以及总结性的《纳西东巴文地契研究述要》。规程研究方面，喻先生译释了《祭天古歌》规程。东巴文题词研究方面，包括《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贺词二则译释》《和才东巴文题词译释》《白地阿明灵洞东巴文题词译释》。帐簿研究方面，《第二辑》刊布了《和志本东巴借条译释》。

这些东巴文应用性文献，都是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在川滇边远山区收集到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其中纸本地契、借条、摩崖题词等，是学界首次刊布的新类型，这对于东巴文献的抢救性收集整理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四、东巴文纪年经典研究及经书断代的探索

东巴文断代研究困难很多，其产生的年代很难查考，但通过东巴文献上的纪年标记，可以确定其抄写的时代。东巴抄写经书时，往往在卷末写上跋语，有的有抄写的时间，可称为纪年经典。据喻先生研究，纪年经典的纪年方式有年号纪年、花甲纪年、年龄纪年3类。年号纪年经典记有绝对的年代，是确定东巴经抄写时间的直接证据。有的花甲纪年和年龄纪年经典可以参照东巴生平旁证材料确定其绝对年代。

《第二辑》收《〈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纪年经典述要》等论文4篇。喻先生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所收东巴经897种中，钩稽出有纪年跋语的经典共115种，并对纪年经典在东巴经断代研究中的价值、纪年方式、经典绝对年代的推勘、有关史实的校订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五、东巴文化研究史的考证

喻先生第一次考述了国人所编第一部东巴文字典的情况。杨仲鸿（1903—1983）是纳西族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企业家。他满怀保存民族文化的赤忱，编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东巴文字典，在学术史上有开创之功。但他的字典没有出版，字典的情况只见于前人的零星记载。喻先生得知杨仲鸿字典的稿本现藏北图的信息，1998年和2000年两次到北图查阅该书，其后一直跟踪调查杨仲鸿和字典的有关问题，写成《杨著〈摩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述略》和《补记》，使杨仲鸿和字典的有关情况得以基本澄清，增进了学界对杨仲鸿其人和字典的了解，对学术史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喻先生还利用纪年跋语的研究，根据跋语的记载考订出不少东巴的生年，纠正了前人讹讹。

六、研究方法的突破

《第二辑》引进了较多新的研究方法，如《丽江东巴文残砖契重考》引进了甲骨文缀合和残辞互补的方法；纪年经典研究系列论文采用了郭沫若确定铜器断代标准器的办法，提出了“分地域选择若干有明确时间标记的东巴文献作为断代的标本，在此基础上，根据文字、书体、内容、抄写人等因素系联同类型的经书，逐步建立按时代和地域划分的文献组群，并进一步勾勒出经书、文字、语词的纵的发展演变系列和横的地域差异及联系，为下一步东巴文的断代和分域研究创造条件”的思路；《〈木氏宦谱〉纳汉对音中的明代丽江汉语方音》纳汉对音材料来研究了明代汉语方音。《关于哥巴文字源考证的几点看法》提出考证哥巴文的字源，应充分重视哥巴文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充分重视纳西族两种自源文字东巴文和哥巴文的内在联系，充分重视哥巴文在经典中的运用情况。

七、《第二辑》不足之处

1. 东巴文指事字的研究不足

喻先生《纳西东巴文“六书”概说》中对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借形均有很好定义和论述，但对于指事，则显得研究不够。喻先生把指事界定为：由非象形的抽象符号或由象形、会意字加非象形的抽象符号构成的字。由于对抽象符号的理解存在分歧。所以喻先生又说：“若将虚拟的抽象符号看作声音、气味等非视觉形象的视觉形象化，似亦可以归入会意字。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 纪年跋语的统计存在缺漏

喻先生开创了纪年跋语研究的新领域，并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钩稽出有纪年跋语的全部经典共 115 种。喻先生采用手工统计方法，在文献量大，任务繁重的前提下得出这样的统计结论，已经难能可贵。

现在据我们采用资料库的方式统计《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所有跋语，发现喻先生的统计有所遗漏，特别是对于未写在经书开头和结尾的跋语，这样的缺漏也在所难免。

如第 60 卷《超度死者·用九种树枝除秽·报恩》经书中间有两则跋语，分别是“这本经书是东阳东巴年二十八岁时写的，是民国十五年那年写的，活着的男人虽然会老死，但经书是不会老死的。”“这本经书是民国十六年写的，是我二十八岁时写的，人们会衰老死亡，但经书是不会衰老死亡的，会代代很有价值的保留下来。祝所祭的死者，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跋语统计存在缺漏还使某些考证成为孤证，喻先生据《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24 卷《禳祭鬼仪式·白蝙蝠求取祭祀占卜经》跋语“花甲土阳龙年写的，是民国十七年。希望后世代代相传，千代百代，得到祭祀和占卜的威灵。我满二十九岁时写的。是好地方鲁甸盘瓦训腾若山麓祭司东尤的经书。”中花甲和东巴当时的年龄考订出东巴东尤（即和乌尤）的生年为 1900 年。喻先生的考证可谓缜密有据，惜为孤证，如再有类似经典参订，则结论更加确凿不移。《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54 卷《关死门仪式·结尾经》跋语：“好地方鲁甸阿双箐的利补东巴东杨，三十五岁时写成，时间是在干支属木、属狗的那一年写的。”查干支属木、属狗的年份，正为 1934。1934 时东巴三十五岁，则其生年确为 1900 年。

3. 《延寿仪式·大祭署·建署的白塔》的抄写年代

喻先生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年龄纪年经典》推断《延寿仪式·大祭署·建署的白塔》经书的抄写年代为 1886 年。如果真是 1886 年，那这本经典的抄写年代也可谓相当早，十分珍贵。但喻先生将跋语中的东巴人名普知登梭（和文质）误为梭补余登（和世俊），正确的理解应为普知登梭 27 岁所写，这本经书的抄写年代应为 1933 年。

《第二辑》还存在小的校订错误，如 281 页正数第六行：“李霖灿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见到的最早的一本纪年东巴经为康熙五年”，而 300 页中又为“最早的为康熙七年”。按：均应

为康熙七年，281 页可能存在笔误。

参考文献：

李霖灿（1984）：《么些族文字的发生和演变》，《么些研究论文集》。台北：台湾故宫博物院。

喻遂生（2002）：《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玉振金声探东巴——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电子邮箱：dzhy77@163.com】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邓章应）